

# 岑桑是一代出版人的优秀代表

——著名学者林贤治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茜

羊城晚报：自从岑桑去世以后，有不少怀念他的文章，您很早就进入广东出版界工作，和岑桑有过接触吗？对他印象如何？

林贤治：我从乡下前来到广州工作逾四十年，初到出版社，就和岑桑先生有联系。接触中，觉得他是个醇厚、正直、富于感情而又作风严谨的人。他爱护青年，珍惜人才，在出版工作方面很有事业心。

羊城晚报：和他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

林贤治：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最早向我约稿的人便是岑桑先生。那时，我还是乡村医生，才发表过一个组诗，在文坛上寂寂无名。他正在筹备大型文学杂志《花城》，通过南方日报社社长关振东先生向我组稿。我寄出一首长诗，他即发表在创刊号上。由于户籍在农村，又没有大学文凭，到出版社后只能做临时工，无法办理迁移手续。岑桑先生很关心我的调动问题，多次过问，而且从中做过一些很具体的帮助工作。



林贤治

在一些特殊时期，作为人民出版社社长，岑桑先生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当他了解到我有鲁迅传的计划时，当即鼓励我动笔，并表示完成后交由他编辑出版。这就是后来的《人间鲁迅》。此书重印达二十版次，在重版后记中，我对岑桑先生表示了特别的感谢。多年以后，他还特约我为《岭南文库》撰写“鲁迅在广州”一书，我因有别的写作计划婉辞了，为此抱愧至今。岑桑对我的编辑工作是信任的，曾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一首新诗从书交由我负责编辑，北岛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北岛诗选》，就是我做责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羊城晚报：“岭南文库”是岑桑主要筹划的一个“工程”，既有普及系列，也有学术系列，影响很大。类似这种出版工程有何现实意义？

林贤治：《岭南文库》是一个较成系统的地域文化积累的项目。它致力于抢救和整理相关史料，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优秀文化的保存。

羊城晚报：如何定位岑桑在广东出版界中的地位？

林贤治：岑桑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成就，与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史有很大关系。说到贡献，集中表现在“文革”以后，戴厚英的《人啊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这时，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而他在广东地方文化积累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开拓性，《岭南文库》可谓大成之作。

羊城晚报：在广东出版界还有哪些类似岑桑这样的人？

林贤治：以我所见，近五十年间，广东出版界除了岑桑，还有苏晨、李士非两位，堪称有文化理想与人文关怀的出版家。他们具有卓越的见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一面发掘人才，一面推出作品。可惜的是，后两位从事出版的时间太短了。

羊城晚报：在全国范围内，广东出版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您认为衡量一家出版社影响力的标准有哪些？

林贤治：可以从以下几点考察：一、有多少在国内受大众欢迎的出版物，即所谓“畅销书”；二、有多少为文化精英，即我们常说的“读书人”乐于搜读和谈论的读物，这些读物可能是小众的，但常印常销，人称“常销书”。至于获奖之类，奖项于今五花八门，在我看来倒不是不足为据的。“常销书”是在与时间的博弈中保留下来的，它的占有量对出版社来说很重要，这就是积存的“家底”。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有许多品种在不断重版，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出版社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省份，作为出版大省的广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林贤治：与北京、上海、南京比较，广州没有专业的译文出版社，译本在出版中所占比例极小；引进版图书相对缺席，对一个近代以来以“开放”著称的南方文化重镇来说，也需要补足；在近现代史中，广州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位置。对此，出版界要有认识，有使命感，然后才可以谈作者的发现与培养，以及书稿的组织问题。从未同岑桑先生谈这些，我总觉得这是作为领导者的事。

羊城晚报：您觉得岑桑作为一个“现象”，对于广东出版界有何启示？

林贤治：在广东出版界，岑桑先生不是孤立的存在，准确一点说，他是那一代出版人中优秀的代表之一。据我所知，像萧萧、黄秋耘、苏晨、李士非等，他们都是理想、有情怀，一生切切实实地工作着的人。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 日前，《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在岭南会开幕 岑桑：永远粲然一朵花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12月9日，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在广州二沙岛岭南会展览馆展出。

岑桑出生于广东顺德，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执行主编等职，2022年2月26日在广州辞世，享年96岁。

作为一位根植岭南大地的作家、出版家，岑桑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领域成果丰硕、建树良多。他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共计300多万字、印行200多万册，其中包括他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散文名篇《当你还是一朵花》，脍炙人口；他在广东出版战线奋斗60年，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推出了数百种精品书籍，影响巨大。

此次展览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年谱简编的形式展示岑桑不平凡的一生，辅

以社会各界人士对岑桑各个方面的评论，呈现岑桑的整体形象；第二部分展示岑桑在各个时期的文艺创作成果，反映其文艺名家的精神风貌；第三部分展示岑桑的出版生涯，再现南粤出版名家风采；第四部分展示岑桑主持编辑出版的《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展现其岭南文化研究、出版的重要成果。

作为广东出版界的杰出代表，岑桑的出版生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出版界的繁荣与发展。他的出版成果，践行了广东出版人对岭南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新。此次展览不仅可以让社会各界了解岑桑先生的生平事迹、业绩成就，领略一代出版人的情怀人格、光荣梦想，还可以一览1949年以后广东出版事业和岭南文化建设的历史，领会一代广东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

据悉，本次展览属于主办方每年一度的岭南文化人物系列展览。在岑老生前获其本人首肯，展览筹备之际，岑老辞世，故改为回顾展，以寄托主办方及文化界对岑老的追思与缅怀。

在去世前几个月，岑桑曾打算用一年时间写就一生的回忆录。“当回忆录仅写下一万字的时候，他就离我们而去。”岑桑之子岑之邦说，“今天看到《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我们觉得父亲的回忆录其实写完了。”

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陈海烈介绍了岑老与其主持创办的《岭南文库》。“他担起广东的出版事业落后于人，内心充满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投入到丛书开拓工作中，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作出了突出贡献。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岑桑电子书链接二维码

陈俊年深情回忆受教于岑老，与之共事的点点滴滴。“岑桑拥有多副文笔，几乎‘通吃’文学品种，均有精品佳作。”他以“三精”概括岑桑文字风格：精准、精炼、精美。



岑桑画像 岑之邦 绘

吴小茜[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

## 31载，《岭南文库》结硕果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的契机和重点是什么？

吴小茜：《广东文化人物展》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关注和致敬对我省文化领域有卓越贡献和德艺双馨的人物。今年举办的《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是我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精心策划和制作的第十三年展。岑桑先生终其一生敬业奉献、默默耕耘在文学界和出版界，曾获得过不少高级荣誉和称号，对文学创作后辈和出版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次展览是岑桑先生第一次个人回顾展，向观众呈现他一生的事业发展脉络，讲述了岑桑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经历，及奠基出版界革新发展和创立学术出版事业——《岭南文库》的故事，还原了一段绚烂的广东文学和出版历史。藉此展览，我们除了向岑桑先生的贡献和他那甘于清苦、乐于奉献、实事求是的奉献精神致以深深的敬意之外，也希望他的事迹与精神激励更多的文艺人和出版人，推动广东人民的精神食粮事业永葆活力，如滔滔珠江水般勇往直前。

羊城晚报：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与岑老有怎样的渊源？

吴小茜：《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策划于2021年岭南文库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这要从《岭南文库》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缘说起。1993年，《岭南文库》已出版了四本书，遇到了学术出版难、资金短缺的问题，他拿着这四本书找到了时任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杨资元，介绍了这套书的出版意图和未来规划，请求促进会予以经济援助。杨资元同志向时任促进会

会长叶选平同志汇报，并商定促进会这个社会组织出资支持《岭南文库》。

1995年，为使出版工作长期、自主地办下去，选平同志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浩同志写信，倡议组建《岭南文库》专项出版基金。这个出版基金最终由促进会、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广州市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多方出资，以1020万元的本金成立。这个由社会各界力量共同组成的专项出版基金，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长效机制，使得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得以良性延续，进行到底。这是一段反映广东人重视文化建设，敢于走在时代前沿的历史。

羊城晚报：《岭南文库》是岑老重要的出版成果。其成功创办与持续发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验？

吴小茜：一项持续开展了31年的出版工作，并且筹划了未来版图和持续开展计划，是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魄力和规划能力的，且还要有持之以恒、

不畏困难的毅力与工作能力。具体来说，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持续关心重视，领导广东省出版界、学术界及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合力参与的成果，是岑桑老同志锲而不舍、专业敬业的志趣。

羊城晚报：出版基金带来的长效机制，对学术出版领域有怎样的启示？

吴小茜：31年来，《岭南文库》编辑部坚持存本付息，专款专用的运作方式，不仅维持了出版工作的良性开展，还发挥了撬动作用，促使各界关注和参与。《岭南文库》专项出版基金的历史意义和运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近年来，利息偏低，出版成本增加是出版社编辑组遇到的难题。我相信，只要“母机”在，前景是乐观的。如果有更广泛的力量支持和关心基金，推动基金发挥积极作用，出版工程将获得更高更强的成绩。

《岭南文库》学术性强，对做学问，对人们系统认识岭南文化、风土人情，具有权威指导意义。出版基金集各界力量而成，且有规范的章程和管理

制度，有严格的执行者。《岭南文库》项目规定：每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主编，并定期召开各界精英组成的选题会议，研究制定选题计划，组织专家、学者著书，保证学术质量，使文库成为获得我国出版大奖的学术丛书。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规范机制，清苦的学术研究和非营利出版项目便有了长治的保障。31年来，出版社保本付息，虽遇困难，仍硕果不断。

羊城晚报：多年来，作为社会公益机构负责人，您认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吴小茜：促进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力量有限，要为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文化事业做事，是要团结社会，协助政府的，我们是政府当助手，补短板，补短处。促进会会有一个指导思想：拾遗补缺，积极务实，量力而为。支持《岭南文库》出版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为之。从社会团体的功能来说，对《岭南文库》的支持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积极探索。文化事业要大家共同参与，共同认知，共同推进，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必能源远流长。



展览现场



### 自序

李怀宇

## 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 知人论世何其难

学：关心百姓的疾苦，捕捉人间的冲突，探窥人心的奥秘，字里行间深合人道主义。在我的访问里，人道主义始终是核心精神。人和人相遇，常讲因缘。我格外珍视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人情味。而当访问了这么多人以后，才渐渐懂得知人论世何其难。有时候一席谈后就品评人，是完全靠不住的。人心如此复杂，即便深交，所见未必客观，所评也难公正。对人的品评很主观，你喜欢的人，别人不一定喜欢；你讨厌的人，也可能正是别人欣赏的人。在见识种种人事后，我想起胡适先生所写的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现实世界的真相，往往需要旁证和辨别，读书阅世要有怀疑的态度。在文学的世界里，悲悯、同情、宽容，常常是理解人的关键。

中国向来文史哲不分家。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史学经典，也是文学名著。太史公运用了想象力来重构历史，通过生花妙笔让兴亡遗事复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现在我们的眼前。古人的喜、怒、哀、乐，以至虚荣、妒忌、轻薄、负心等心理状态，令人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史学家的想象和小说家的想象是极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学家的想象要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并且必须受到证据的限制。而小说家的想象即使天马行空，也是世间万象的折射。英雄、才子、美人、小人跃然纸上，江湖侠客、世俗侦探、奇妙历险、科学幻想层出不穷。历史与现实，虚构与实证，假作真时真亦假，文学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更创造了一个个梦幻的世界。在精神之旅中，也许我们还会思考哲学的问题，天与人、诗与真、善与恶，人生取径路上不但经历八十一难，更产生了千万个为什么。

世道如此坎坷，人海如此苍茫，古今之变与天人之际无法尽付文字。中国文字的奥妙，我曾千百次努力地学习、尝试、理解、感悟，多年苦练的心得，细看不过是一点皮毛。陈之藩先生在变幻时代不甘心地提起笔：“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字里行间描绘的往往是悲天悯人的境界。

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二三素心人，不来常思君，即使一时无法饮茶畅叙，而凭几卷书，读纸上风云，偶有共鸣，会心一笑，便可得宇宙人生大自在。字里行间的妙趣，在风雨中更能体会一二。但愿苦口良药能除病毒，醒世良言能解心结，度一切苦厄。

### 洞见

赵毅衡

## 就我个人而言，岁月能花在思考此种问题上，也是一生之幸

##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叙述不是符号的简单堆积，而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者读合一的意义和时间向度”的文本，简明地说，就是一个说故事的符号集合。由此，就必然落进所有集合的根本问题：“自指悖论”。

正因为叙述的出发方式是悖论，叙述理论的展开也必然充满悖论。说者需要被说才能存在，才能说叙述，这个关键点摆上了这本书的封面，但讨论中却没有充分说透，只是讨论了说者无所不在的种种痕迹。究竟叙述行为本身，如何才能被说出呢？即“说者究竟如何才能被叙述出来呢？”

尽管如此，此书原序中我的欢呼“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绝无仅有”，恐怕是太乐观了。叙述学并不如几何学那样整齐。几何学处理已经抽象为概念关系，记录与无关的变化，总结其规律的是科学报告，是科学/实用的陈述。而叙述必须卷入人，人物、人群、卷入他们的生活经历，一旦卷入人，我们就会发现种种复杂变异，种种歧义。

即便人的行为不得不遵循社会文化的规训，人的思想也不受边缘与规则的拘束，尤其是当叙述成为艺术，想象力就朝狂奔狂奔。叙述学当然要有抽象范畴的论述，但叙述本身的生命力在于于人的实践，必然冲破藩篱，进入尚未测量的领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2011年接受了“广义叙述学”课题，两年后的2013年即很快交稿出版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得快，而是因为从写《说者》开始，我已经思索了30年。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重印，我还是保留这个曾被批评的书名；不是我谦虚不尊重，而是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有人好好理解。

叙述的“本质性内在矛盾”，依然是这个老问题：叙述行为为何不可能被叙述出来？如果竟然被瞥见，又是什么原因？就我个人而言，岁月能花在思考此种问题上，也是一生之幸。